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安全策略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ltz's Structural-Realism

doi:10.30390/ISC.200410_43(5).0002

問題與研究, 43(5), 2004

Issues & Studies, 43(5), 2004

作者/Author : 胡敏遠(Min-Yuan Hu)

頁數/Page : 31-5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4/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10_43\(5\).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10_43(5).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安全策略

胡 敏 遠

(國防大學軍事學院上校教官)

摘 要

冷戰結束後，印度由於經濟快速成長，進而帶動軍事力量的提升。同時，在對外政策上，靈活運用核子戰略的機勢及推展大國外交政策，印度儼然已成為南亞地區的超級大國。而在亞太地區的政治格局中，受印度國力的崛起及「九一一事件」的影響，國際間強權的權力分配也產生了微妙的轉變。本文運用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企圖探討印度近年來對外政策調整，對南亞國際政治結構與大國權力分配所造成的變化，以闡釋印度國家安全政策的目標；印度除了想降低來自巴基斯坦的威脅外，並希望能在全球政治結構中，型塑出自己的大國地位。未來，印度綜合國力若仍能持續成長，並靈活運用對外政策，印度可能會成為南亞區域的霸權國家，並將成為全世界中的「一極」。另外，本文也想藉此研析結構現實主義的部分論點；國際體系中有關「安全」與「權力」、「競爭」與「合作」、「互賴關係」與「易損程度」之間的關聯性，它們彼此之間絕非可以任意操縱，核心在於論述議題的層級為「區域性」或是「國際性」，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對等關係是否為同一等級。否則，探討體系與構成員國之間的互動與互賴關係，將會出現錯誤的認知。

關鍵詞：結構現實主義、印度、外交政策、安全政策

* * *

壹、前 言

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運用現實主義理論探討國際事務，一直被視為國際關係學科研究的主流。此一學科在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代間，遭科學行為主義的挑戰後，使該學科的論述得以另一種新的觀點，解釋國際社會出現的新現象，結構現實主義即是在此種潮流的推動下，應運而生。^①結構現實主義基本上融合了傳統與科學行為的研

註① 結構現實主義是 Robert O. Keohane 所用之名稱，而新現實主義則是 Richard K. Ashley 所用的名稱。事實上，二者所指的是同一個理論，筆者偏好使用結構現實主義。參閱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第39卷12期（民國89年12月），頁70～72；See Robert O. Keohane, "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7; Richard K.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 257.

究方法，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另一門學派，然而結構現實主義研究的若干假設仍與古典現實主義相同，研究的路徑與方法也與古典現實主義類似，但卻是對古典現實主義的一些觀點提出修正與補充。故結構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應可歸屬為同一的研究途徑。

本文運用結構現實主義探討後冷戰時期印度的國家安全政策，主因結構現實主義的核心價值對體系結構、權力分配、安全認知與國家利益等觀念，有一完整的理論體系。有鑑於此，筆者是以印度綜合國力不斷的崛起為主軸，加上其靈活運用核子戰略的機勢及推展大國外交政策，以闡釋印度近年來的國家安全政策。伴隨上述的命題，幾項有趣的問題也會隨著印度國力的崛起，浮現在亞洲甚至國際的舞台上。首先，印度的國力水準是屬於世界性或是區域性的強權？另外，不斷崛起的印度強權，是否即代表其國家安全將永遠獲得保障？最後，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是否能完全解釋印度的國家安全策略？若無法完解釋，理由何在？針對上述問題，本文的研究概可區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回顧華爾志（Kenneth Waltz）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觀點；其次是就後冷戰時期印度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力量）的興起，對南亞國際政治結構的影響，作一說明；再者是研析印度與亞太周邊大國的互動情形，以便明瞭印度對國家安全的認知與其政策的調整；最後則檢視結構現實主義的部分論點，以期能預測印度國家安全未來的走向，及對南亞國際安全有一清晰的認識。

貳、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回顧

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辯至上個世紀七〇年代末期，進入到第三次的論戰—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爭論。^②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在第三次爭辯的提出，實際上僅是前次論戰演進出的產物，因為第二次論戰的議題，是涉及到國際關係研究方法上的爭議。由於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方法，多是以歷史、哲學或法學的研究途徑為主，而新一學派的研究途徑則接受行為主義的科學觀點，以較嚴謹的科學方法如統計、比較、模擬…等方式，以建構出新的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的辯論在議題上，又較前次論戰更為廣闊，其主要的議題則是以研究國際關係的本體為主；即是探究國際關係「知識」的理論。^③事實上，運用科學行為主義至國際關係上的研究，實出於七〇年代間國際

註② 大多數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認為國際關係理論歷經了三次大辯論，第一次是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爭辯；第二次是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的辯論；第三次則是一九七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間的「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爭論；即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辯。參閱 Jim Geor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Thinking Space: 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 1989), pp. 269~275.

註③ Wayne S. Cox and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4), pp. 1~5.

政治結構出現了一些變化所致。在美國，因飽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對蘇聯核武優勢的喪失，加上越戰後的後遺症，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調整其對外政策。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方法，顯然已無法滿足當時國際政治研的需要，科學行為主義才能因勢利導的進入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理論上，任何一種新理論的創新與發明，是很難將原先的理論完全丟棄，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也即是主張將傳統現實主義學派和科學行為主義學派在方法論上的相互運用，取長補短以融合為一科學性的現實主義。由於此一論述具有延伸和演進前次論戰的特性，其理論的特徵與假設，仍與傳統現實主義有若干的關聯性。故學界通常將現實主義區分為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與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兩大學派。^④

一、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概述與假設

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有三：第一、國家為中心。國際事務的研究是以國家為主要單位，其他的單位如個人、團體或國際組織都僅能視之為次位。^⑤第二、理性決策。國家在從事國際間互動行為時，都會以國家利益作為考量標準，因此他會審慎地評估各種選擇成本，以追求最大的利益；第三、權力至上。國家以追求權力最大化為目標，因為國際社會的本質為無政府狀態，因此國家必須依自助方式維護其利益。^⑥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依據上述的假設，提出古典現實主義的六原則，1. 國際政治根基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所主導；2. 國際政治的主要考量以權力界定利益；3. 以權力界定利益是普遍有效的客觀範疇；4. 道德原則的界定因時空而有不同，而且運用在個人與國家時也會有差異；5. 特定國家的道德渴望並不是管轄宇宙的道德法則；6. 國際政治是自身分析的自主領域。^⑦從摩根索的論述可以得知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論點，是從人性的「利己」觀點出發，強調世界的競爭性及國際社會無秩序狀態，各國利益無法調和的本質現象，所以國際關係的研究只能以「權力」和「利益」的追求為軸心，而一切「利他」與「道德」觀念，都會使國家遭受最大損害。

結構現實主義學派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展露頭角，並很快的席捲了整個國際關係的領域。^⑧該理論的主要特徵；在假設上他與現實主義相同，承認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以及國際關係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而在此基

註④ Richard Little, "Structuralism and Neorealism," in Margot Light and A. J. R Gro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1985, p. 74, 轉引自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20。

註⑤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78), p. 8.;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94;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8.

註⑥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ch. 1.

註⑦ *Ibid.*

註⑧ Robert Keohan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9.

本假設上，強調國際關係的秩序和限制，並重視全球系統的合作，和經濟功能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此一思潮實始於華爾志於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該書也首次提出了結構主義的理論，為結構現實主義學派開創了先河。華爾志的結構現實主義是運用國際體系和權力的分配為架構，將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國家、權力和利益的概念納入其中，並藉國際權力分配的型態，作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結構現實主義雖然與古典現實主義同樣重視權力，但是他更強調權力的工具性，用以達到國家安全的目標。國際體系的基要素實包括系統的基本單位與系統本身的結構。^⑨

二、華爾志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開展

華爾志可堪稱為結構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其體系結構學說的提出，也代表了結構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的區別。華爾志對國際體系結構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體系結構理論：華爾志認為一個體系包括兩個變量，其一是結構、其二是單位。^⑩國際體系的結構是指諸多國家行為體以自身力量的權力決定在體系中的排列。而在國際體系中，結構是由每個單元（國家）所組成，在形式上每個國家都具主權平等的權力，也不需要服從其他國家的安排，整個國際體系呈現出分散和無政府的狀態，而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結構是根據單元之間能力的分配來界定的。能力分配則屬於權力的分配形式，權力分配的變化則會直接導致體系結構的變化。簡言之，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決定了國際體系的結構，而各部的排列組合產生了結構，排列的變化會導致結構的變化。^⑪職是之故，華氏的國際政治結構實際上應該包含了兩個變量：體系的深層結構（屬於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分布性結構（屬於國際權力分布狀況）。^⑫

(二) 體系結構與行動體的互動關係：華氏理論中有關體系結構構成的三個要素，包括：第一，國際體系是無政府而非等級的；第二，國際體系是由功能相同的國家行為互動體構成的；第三，國際體系的變化是由體系內力量分佈不同引起的。^⑬華氏認為前兩項要素是不變的，而第三項要素則是處在變化狀態之中，因為在無政府的國際狀態中，國家不論大小，不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國家，他們所考量國家的功能都是以

註⑨ Robert Keohane,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bid.*, pp. 322~45; 轉引自邱坤玄, 「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外格局」, *東亞季刊* (台北), 30卷第3期, 夏季刊 (民國88年4月), 頁25。

註⑩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9.

註⑪ *Ibid.*, p. 80.

註⑫ Barry Buzan, Charles,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1~54.

註⑬ Kenneth Waltz 著, 胡祖慶譯, *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台北: 五南, 1997年), 頁112、118、121。

國家安全及絕對主權為主。^⑭至於第三項，華氏認為結構應當從三方面加以界定：首先，結構應根據體系構成單元的排列原則來界定，而這種排列原則只有兩種，即等級制原則和無政府原則；其次，結構應根據體系構成單元功能上的差異來界定；最後，結構應根據體系構成單元間的權勢分布狀況來界定。^⑮等級制體系中的單元間本質上是一種權威關係，無政府體系中的單元間本質上是一種實力關係。^⑯所以體系結構並非是一個靜態的結構，而是一個動態的，結構可以改變行為體的行為，並且可以改變行為體間的互動結果。國際體系除非發生重大的革命事件，否則結構具有一種持久性，而隨著結構發生了變化，單位才會隨著體系的改變而有所變化。另外，體系層次因素和單元層次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並且對國際政治現實都會產生影響，因而對國際政治的研究必須同時兼顧兩種因素的作用。^⑰易言之，華氏的體系結構理論即是在探討各個行為體與體系的互動關係。

(三) 權力與安全觀：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最顯著的不同，在於他們對權力與安全的界定不同。古典現實主義將國家追求權力視為國際社會成員欲追求的目的，摩根索甚至提出權力等於利益，權力更是等於目的。^⑱華爾志則認為國家最終目的是要藉權力而獲得安全，權力僅是實安全目的的一種手段。華氏提出了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觀，他賦予權力新的概念和功能。他認為權力在體系中大小排列形成結構，權力的變化引起結構的變化，權力在國家間的分配及分配的變化有助於結構的形成和對結構的變化。^⑲

(四) 均勢理論：華爾志認為均勢理論是結構現實主義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他甚至認為兩極體系下的權力分配，是最有助於國際體系的平衡與穩定。^⑳換言之，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家不是謀求權力最大化，而是尋求權力的平衡分配，而權力僅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所以，均勢理論究其實質意義則是大國間實力平衡的分配關係。

三、華爾志結構現實主義的價值

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古典現實主義是從國家和人性層次探討國際權力運作，但卻未對國際體系的層次予以說明。其次，古典現實主義並未討論國際體系權力分權分配的問題，但卻強調國際社會權力平衡運作。誠如學者霍夫

註⑭ 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頁 139。

註⑮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9, 81, 101.

註⑯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1995), p. 76.

註⑰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0), pp. 44, 34.

註⑱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

註⑲ *Ibid.*, pp. 123~128.

註⑳ *Ibid.*, p. 117, 161~170.



曼 (Stanley Hoffmann) 認為古典現實主義與華爾志結構現實主義的最大差異在於；古典現實主義著眼於國家，強調世界處於無政府狀態。結構現實主義著眼於體系，認為世界包含著國際政治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①此外，華氏結構現實主義的最大價值和意義，說明了當今國際政治的競爭和對抗的無政府狀態，仍為國際社會的本質。關於此點，誠然有許多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及全球化的學者均提出反駁，並以「相互依賴」的論點來說明無政府狀態的荒謬。然而，當代世界在物質上和文化上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增長的同時，同樣也存在著一種日趨明顯的分裂化趨勢。^②所以，我們實在無法掌控當今及未來的國際社會會處於和諧、無爭鬥、且有秩序的互賴社會，而未來的社會也不一定比現今社會好。正因為如此，華氏的體系結構理論，在未來仍不失為一項研究國際關係的重要理論依據。

不可諱言，華爾志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不論是在冷戰期間，甚至到了冷戰結束以後的期間，都一直為研究國際關係學者所喜用的理論。華氏在二〇〇〇年發表了一篇專題名為「冷戰後的結構主義」的長篇論文，其結論即指出：除非發生根本的體系變革，否則結構現實主義仍然是國際政治的基本理論。^③在他認為無論國家之內的政治體制如何改變，或是國與國之間的互動產生了多大的變化，只要整個國際體系的結構不變，結構現實主義並沒有過時，仍會體現在民主、相互依存、國際制度、均勢、觀念與規範等五個方面。

叁、崛起中的印度強權對其安全環境的認知與轉變

從印度在南亞國際政治與外交的歷史發展來看，一九九〇年代以前，因受冷戰舊思維的影響，印度是以「聯盟」、「對抗」的安全觀與中共及巴基斯坦抗衡；九〇年代以後，則致力加強與周邊大國的外交關係，進而從國際權力結構中降低與「中」、巴兩國的衝突，以創造印度的國家新安全觀。由此觀之，印度於兩個時期的安全觀，其最大差異在於對「安全環境」認知的不同，此一差異則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改變所致。

註① 參 Stanley Hoffmann, *Primacy or World Ord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New York: McGraw-Hall Book Company, 1980), pp. 109, 188.

註② 關於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和建構主義理論相對於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缺陷，參見：Joseph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1988), pp. 485~508; Dale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2000), pp. 187~211.

註③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39~41.

一、兩極對抗之下的國際體系對印度國家「安全觀」的制約

印度擁有 297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超過十億，國內農、漁、牧業生產豐沛，各項礦產儲量均極為豐富。^②故印度自獨立建國以來，即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將與美國、蘇聯和中國大陸並列齊驅的大國。^③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曾指出，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體系將至少包括六個主要的強大國家－美國、歐洲、中國、俄國，也許還有印度。^④然冷戰期間的印度，因受兩極體系格局的制約，在政治上選擇了與蘇聯保持密切的友好關係，以便與美國所支持的巴基斯坦對抗。而與中共外交關係的發展上，又受制於與中國邊境上長期存有領糾紛的爭議，及從一九六〇年代起「中」俄之間的交惡（屬於社會主義國家體系中的對抗格局），使得印度在國家安全的考量，必須挹注大筆人力與財力增強國防實力，以應付來自西部（巴基斯坦）與北部（中共）的威脅。

（一）巴基斯坦問題

印度與巴基斯坦自二戰結束以來，彼此爲了喀什米爾領土的爭議，衝突不斷。印巴之間的武裝衝突更隨著兩國核子武器數量的擴張，核武恐怖陰影早已對全球造成巨大威脅。就印度而言，印度必須制壓住長久以來的勁敵－巴基斯坦，以免除安全上的威脅。但印巴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卻夾雜了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對抗，以及「中」、印、巴之間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問題，致使巴基斯坦成爲印度國家戰略中最棘手也須最先考量的焦點。

（二）「中」印衝突

印度與中共均爲亞洲地區的大國，長期以來卻因領土爭議、民族意識、宗教文化等歷史包袱，而無法拓展良性的外交關係。在印度對中共的安全認知中，兩國除了領土糾紛之外，尙包括夾雜在「中」印兩國之間的西藏問題。

1. 領土的糾紛

從歷史宏觀角度看，「中」印兩國在西方殖民時期，都曾遭受過外來強權的侵略與迫害，因而兩國自建國以來即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對領土與主權的維護相當強硬。「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主因英國殖民勢力撤離時，未能明確劃分雙方的國

註② 印度自然資源豐富，其可耕地面積占南亞總量的 83%，居世界第二位，灌溉面積居世界首位。煤炭儲量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中國。鐵礦儲量僅次於巴西和澳大利亞，居世界第三位。雲母儲量居世界第一位。此外，鈾和鈷的儲量十分豐富。詳見，孫士海，*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 年），頁 7。

註③ V. M. Hewit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outh Asia* (Manchester, U. 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5.

註④ 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chuster, 1994), pp. 23~24.

界，²⁷導致兩國爲了領土的爭執，始終存有芥蒂。「中」印雙方甚至在一九六二年於邊界地區發生過嚴重的武裝衝突，之後雙方皆重兵屯駐於邊境地區，大大小小的武裝衝突更是層出不窮。然而，兩國自一九六〇年代起，爲了解決爭端，舉行過數十回的邊界談判，惟均未能達成協議，雙方外交關係因而陷於低潮。

2. 西藏問題

「西藏問題」爲另一項制約「中」印關係正常發展的重要因素。從歷史與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印度與西藏在地理上極爲接近，而在宗教信仰上又與藏人類似，長期以來藏人與印度人民保有密切的往來，印度政府對西藏的未來發展也給予高度的關注，導使中共對印度極爲不滿，認爲印度暗中支持西藏分離分子的獨立運動。但從國際權力的結構來看，印度政府卻又不得不承認西藏自一九五〇年代起已被整合於中共的軍事體系中，並成爲中共軍力向外擴張的平台，印度則首當其衝的在中共軍事的壓制之下。²⁸因此，印度對其安全環境的認知上，必須加強與西藏的實質關係，其目的是要遏止中共將西藏當做軍事平台，降低來自中共的軍事威脅。印度的一些軍事家甚至認爲西藏可成爲中印之間的緩衝地區，更是保持印度安全的最經濟的辦法。²⁹在此種地緣與歷史的背景下，冷戰時期印度對中共的安全考量，「西藏問題」，始終是印度用來制中共的重要槓桿。

(三) 中共在南亞地區權力擴張對印度發展的影響

印度傳統的安全概念中，是將南亞次大陸看作印度的勢力範圍，而且把印度和東南亞地區當作他的安全範圍。但是在北邊與中共接壤的西藏地區，中共的軍事力量卻能直接涵蓋整個印度地區。所以，印度自獨立建國以來，即分別拉攏喜馬拉雅山三個山國（尼泊爾、錫金及布丹），並與其訂立了所謂「和平友好條約」，以此確立與這些國家的特殊關係。印度並通過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手段，成功地建構起在喜馬拉雅山的安全防線。³⁰相較於中共，自從一九六二年與印發生邊界衝突以來，除了加強在在中印邊界地區的軍事力量外，並積極與孟加拉與斯里蘭卡兩國

註²⁷ 中印邊界長達二千餘公里，自古以來中印雙方和平相處並未因邊界的劃分與歸屬問題而起干戈。雙方的邊界問題是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殖民時期所創造出的歷史錯誤，更爲「中」印雙方百年來爲此爭議不休。中印邊界問題的關鍵區域是所謂「麥克馬洪線」。這條線是一九一四年英人麥克馬洪非法制定的，它從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向北深入中國領土九萬平方公里，但中國政府對此卻從來沒有承認過。而自「麥克馬洪線」劃分後，雙方對領土與主權的爭議隨即浮上檯面。邊界爭端地帶有東、中、西等三段地帶，其中以東端地帶幅員最廣，爭議最多，它包括了中國大陸、印度、緬甸交界處的傳統習慣線至麥克馬洪線的九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西段則包括喀喇崑崙山山口附近地區。中段則包括尼泊爾以西的中國阿里地區同印度喜馬偕爾邦以北方邦接壤的一段。參閱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台北：幼獅，1996年），頁89～92。

註²⁸ 龐英瑞編，*中共在亞洲崛起之安全意涵*（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2年），頁276。

註²⁹ 楊平學，「淺析制約中印關係發展的幾個主要因素」，*南亞季刊*，第1期（四川：成都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0。

註³⁰ 同前註，頁39。

拓展外交關係，同時更與緬甸擴展經濟合作領域，這些舉動在印度看來都是對其權力範圍的一種挑釁行爲。

印度對中共最爲不滿的行爲，莫過於中共對巴基斯坦的軍備援助。同時，巴基斯坦更是積極的與中共結盟，以期獲得武器裝備、軍需品及外交的支援，並希冀中共能在其進行激進主義運動時，提供政治及軍事援助。^①因此，冷戰期間「中」印對抗的情勢中，巴基斯坦與西藏都是「中」印雙方喜好玩弄的王牌。然而印度與中共最大的不同是，印度政府從未動用武力介入西藏與中共的糾紛中，遑論武裝西藏反抗力量，以支持藏族脫離中共的統治。

二、後冷戰時期印度對安全環境的「新認知」及強權國家對印度崛起的觀感

冷戰結束後，印度爲拓展經濟，不斷努力地改善與周邊大國的外交關係，此舉遂使印度的影響力大爲增加，且對南亞國際權力結構產生了一些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爲達成國家安全之目的，從一九九〇年代起即不斷投注大筆國防經費發展核武，並於一九九八年五月間不顧美國與全球大國的反對，進行五次的地下核子試爆，進而引起全球的密切注意。^②若從結構現實主義觀點來看，當前印度的對外政策，乃是因應外部環境的認知而採取的外交政策。印度的著眼是從國際體系的格局中，爭取其在南亞地區的權力分配權，鞏固其爲南亞地區霸權的地位，進而成爲國際政治體系中的一「極」，以降低印度的安全威脅。事實上，印度要想達成上述的目標，必須克服中共的阻攔，同時又須與亞洲地區周邊的大國相處得宜，尤其是中共與美國，才有可能成功。現就上述問題分析如下。

(一) 崛起的印度

冷戰結束前夕，印度最大靠山—蘇聯在與美國長期對峙下敗陣下來，印度隨即在對內與對外政策上作了調整。在經濟上，印度改採「自由化」與「全球化」的政策，並在各個經濟部門引進競爭機制，充分發揮市場調節功能，徹底推行以出口代替進口戰略，積極改革金融體制和經濟體制。從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其整體綜合國力年年不斷大幅度上揚。九〇年代以來，印度在經濟成長上更維持高達 6%~7% 之間，^③其整體國力也在經濟成長的帶動下，不斷向前邁進。至二〇〇〇年印度國內生

註① 有關巴基斯坦軍事戰略之分析，參見 Ashley J. Tellis, "The Air Balance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rends, Constants and Contexts," *Defense Analysis*, Vol. 2, No. 4 (1986), pp. 264~268.

註② 印度於 1998 年 5 月間進行五次核子試爆後，隨後又在當年發射了兩枚 IRS-IC 衛星進入軌道。若按核武發展的過程而言，印度已具備發展洲際彈道飛彈的能力。西方軍事觀察家咸認爲，印度已有能力製造約 90 件的核武器。相關論述請參閱 Christopher F. Foss, "Pakistan Extends Its Missile Capabilitie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3 (March 1997), pp. 122~124; Frank Barnaby, "Trials Provide Data for Range of Weapon Yields," *Jane's Defense Weekly*, May 27, 1998, p. 3.

註③ 文富德，「西方經濟衰退中的印度經濟」，*南亞研究季刊*（四川：成都大學出版社，2000 年 2 月），頁 3。

產總值已逼近 5000 億美元，外貿出口為 431 億美元，進口為 608 億美元。依據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均價計算，印度的經濟實力已名列為世界第五位。^④

在政治上，印度長期以來即勵行議會民主制。上個世紀末期，印度政壇上出現頻繁更替局面，但政府卻能按照民主程序進行改革，一九九八年由瓦杰帕伊（Atal Behari Vajpayee）領導的人大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於大選中獲勝。瓦杰帕伊在政治上主張世俗主義的包容態度，尊重少數族群的權力，公開發表彌合穆斯林矛盾的言論，使得印度內部得以順利渡過政治紛擾的束縛，並得以保持對外團結一致的形象。而在對外政策上，也改變冷戰時期不結盟的原則，並藉由聯合國作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平台，以企圖建立其在國際上不可或缺的地位。^⑤

在軍事上，印度近年來不斷加強軍備建設及更新武器裝備，並朝軍隊現代化發展的結果，印度已是全世界第四大軍備國家，其軍隊數量達 115 餘萬人，其中海軍擁有各種艦艇 140 多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印度擁有一艘航空母艦及十八艘潛艦。空軍擁有各型飛機 1500 多架，其中作戰機約 850 餘架；包括米格 21、27、29、美洲虎、幻象 2000 等先進戰鬥機。核武方面，現有各類導彈種類達 48 種之多，包括地對地導彈、地對空導彈、空對地導彈、空對空導彈、反潛導彈和反坦克導彈等，^⑥而自 1998 年核子試爆以後，印度的核子武力更是受到世人的刮目相看。^⑦近年來，印度不斷擴張充軍備力量，並大幅提高軍備水準，增大國防預算。二〇〇〇～二〇〇一年印度國防預算為 175 億美元，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3% 至 4%，且隨著印度經濟成長的不斷增強，未來勢必將有更有多的資源挹注於國防事務上。^⑧

從上述政治、經濟與軍事的能力審視印度的綜合國力，印度未來要成為區域性的大國乃指日可待的夢想。而在亞洲國際體系結構中，印度將是一個能與中共分庭抗禮的大國。

（二）印度對安全環境的「新認知」

由於印度未來可能成為亞洲地區的重要大國，因此他不斷審視自己周邊安全的環境，以利於其未來發展。但是，印度在安全的新認知上，卻面臨了三個戰略上的難題。首先、印度如何將巴基斯坦問題重新定位？。其次、如何與一個長久以來即存有敵對關係的中共相處？最後、印度如何在南亞地區與中共進行權力爭奪之時，又能與中共保持合作關係？而这三項難題卻是環環相扣，彼此之間更牽連著印度與整個南亞地區

註④ 馬加力，**關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8。

註⑤ Hanns-Frank Seller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印度：尋求外交與安全政策新形象的國家」**，**亞洲的安全與挑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9年），頁250。

註⑥ 趙曉卓，**南亞雄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86～108。

註⑦ John W. Garver, "The China-India-U.S. Triangle: 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BR Analysis*, Vol. 13, No. 5 (May, 2002), pp. 25～26.

註⑧ 理查·艾林斯、阿隆·佛瑞柏格編，**2001-02 戰略亞洲：權力與目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1年），頁353～354。

甚至整個亞洲地區國際情勢的發展。

1. 印度對「印巴衝突」的定位問題

冷戰結束後，印度深切明瞭印巴衝突的解決之道，軍事手段僅能達成優劣形勢的對抗，無法完全解決彼此長存的問題，因為印度認為，巴基斯坦政權得以維持，主要是基於「宗教的狂熱」，巴國必須藉由與印度在宗教與意識型態的對峙，以維持巴國內的團結形勢，並避免印度從經濟和文化上將巴國吞併。^③基於此，印巴問題要能真正獲得解決，非得從國際結構層面下手。^④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自一九九七年上台以來，即企圖從外交及國際政治層面來解決與巴基斯坦的敵對問題。

事實上，國際社會要處理好印巴之間的衝突實非易事，因為印巴兩國均為南亞地區擁有核武的大國，且長期存有歷史、民族與宗教的仇怨。兩國武力對峙與衝突所引發的軍備競賽，更在一九九八年的核子試爆，進入到最高潮，^⑤此舉更增加了國際間（尤其是美國）處理上的困難度。因為在核試爆之前，美國正不斷深化與中共的政治、經濟與外交關係，在印巴衝突的立場上，又傾向於中共及巴基斯坦方面，導使印度必須以核試爆的方式來表達其國家安全的隱憂。^⑥

此外，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前，美國受印巴核試爆的態度，已逐漸轉變原先的政策（解除兩國的核武設施），同時朝向與兩國律定協商核武穩定的議題；例如企圖在兩國內部建立限制核武發展的機制等，進行多元化的接觸，這些都是受一九九八年核試爆的影響，促成美國南亞政策改變。「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的政策更加推展前述的方針。^⑦事實上，美國政策的轉變，也讓印度尋覓到一個與美國共同解決「印巴衝突」的時機。雖然，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基於戰略需要與巴基斯坦建立密切關係，對印度而言這是一個負面的變數。但印度對於美國的立場表示可以理解，進而力圖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九一一事件」的爆發，使得印度與美國在反恐方面的利益，更為密切。因為，美國在亞洲的重大利益議題上，印度更能發揮直接影響力，諸如促進亞洲地區權力的均勢、反毒品走私、牽制中共強權發展，及反

註③ Neil Joeck, "Pakistani Security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South As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8, No. 4 (December 1985), p. 80.

註④ 楊平學，前引文，頁 40。

註⑤ 一九九八年五月份印度進行了五次的核子試爆，巴基斯坦也在同月的二十八及三十兩天進行地下核子試爆。印巴兩國也先後對世人宣佈為「擁有核武國家。」參閱防部史政編局譯，*亞洲的安全保障 1998-1999*（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8 年），頁 25。

註⑥ 依據印度駐中國大陸大使梅耶所述：「一九九八年印度別無選擇，只能採取我們的核選擇，目的則在於維護我們的戰略空間、國家安全和可貴的國家獨立。」參閱梅耶，「印度的外交政策與印中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 (CASS)；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go to the website at <<http://www.cass.net/chinese/s28vts/wordch-en/ch-dtvdsihl.htm>>.

註⑦ Andrew C. Winner & Toshi Yoshihara, *Nuclear Stability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 C.: The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 2001), pp. 62~63.

對宗教極端主義復甦等，印美兩國可說是有共同的利益。^④另者，印度也擔心巴基斯坦會利用「九一一事件」與美國建立的良好關係，在喀什米爾問題上採激進手段，及對印度採取高姿態。所以，瓦杰帕伊在美國高舉反恐大纛的號召下，立即表態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並努力爭取美國的好感。^⑤因為，受到美國的制約，則可降低「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與巴基斯坦關係改善對印度造成的傷害。

基於此，印度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別著力於二〇〇一年以後印度曾兩次遭喀什米爾省的伊斯蘭恐怖組織攻擊的事件上，以突顯印度的國家安全觀。^⑥在兩次事件中，印度乘機升高危機意識，以迫使美國及西方國家必須重視巴基斯坦的「恐怖行徑」或涉嫌支持喀什米爾激進份子對印度進行恐怖活動。在印度看來，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是極端教義派發展的必然結果，而發生在喀什米爾的越界恐怖活動，正是這種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一部分。^⑦印度運用這兩起事件向國際社會表達印度的立場，目的在引起全球的關注。印度另一項戰略思考，則可藉此轉移國際社會的視聽：認為印度僅是一個窮兵黷武的核武大國。同時利用此一時機，爭取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對巴基斯坦施壓，以使喀什米爾省的恐怖組織能與巴基斯坦脫鉤。顯而易見，印度對巴基斯坦的外交策略，是藉「反激進宗教狂熱」為槓桿，企圖將「印巴衝突」轉化為國際「反恐行動」的一部分，進而在印巴衝突解決的立場上，先立於不敗之地。

2. 印度對中共強權的新認知

中共自八〇年代起因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其綜合國力已大幅提昇，在亞洲地區中共已是一個區域的強權國家。尤有甚者，中共為持續擴大經濟發展的層面，自九〇年代起也積極擴展睦鄰政策，逐漸加深與緬甸、泰國等東協國家的外交關係，並與東協國家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事實上，中共的「睦鄰行爲」讓印度惶恐不安。印度深知，若持續自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以來兩國的對抗局勢，則對印度的發展極為不利，若要化解印度與中共數十年來的積怨實非易事。誠如學者 Garver 認為，「中」印外交關係關係一直無法突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六點：(1) 西藏問題。(2) 領土爭議。雙方對領土的爭議，主要來自於國內官僚體系及其軍事將領的牽制。(3) 南亞地緣政治的爭端。(4) 中巴關係良好。(5) 印度洋的海權之爭。(6) 「中」印雙方對核不擴散問題的立場與看法歧異。^⑧雙方更由於缺乏互信與瞭解，使得雙方決策者對一些重要決策

註④ Garver, "The China-India-U.S. Triangle: 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p. 41~44.

註⑤ *Ibid.*, p. 41.

註⑥ 長期以來，巴基斯坦一直暗中支持、幫助喀什米爾的反政府叛團體（巴國伊斯蘭激進組織），為此印度政府曾多次於國際會議上譴責巴國，但卻無法獲得國際間的有力支援。「九一一事件」後，巴國又發動兩次的恐怖攻擊，分別在二〇〇一年十月一日喀省首府遭恐怖分子炸彈攻擊，導致34人喪生。及十二月十三日印度國會再遭襲擊，導致13人喪生。兩起事件使得印巴之間武裝對抗的勢頭再起，雙方並集中大批武力於喀省邊境地區，印巴戰爭一觸即發。See, K. Sbankar Bajpai, "Untangling India and Pakista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3), p. 113.

註⑦ 張力，「『九一一』事件後的印巴關係與南亞地區安全」，*南亞季刊*，2002年第1期，頁47。

註⑧ John W. Garver,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p. 91~94.

經常陷入僵局，其中包括；民族主義、歷史的記憶、安全的認知、易損程度等。^④因此，「中」印關係實質上的改變困難重重。

毋庸置疑，印度對中共強權的認知，及中共在南亞周邊地區權力的擴張，在在都表達不安的景象。但與冷戰時代所不同的安全觀，印度不再將中共視為「不可變」的死對頭，反之會將中共視為一個競爭對象。^⑤印度對於「中」印之間諸多的爭議問題，以及「中」、印在南亞地區的權力鬥爭，都是以新的戰略維因應之。尤為甚者，印度會利用美國在亞洲欲牽制中共勢力崛起的企圖，設法強化與美國的合作關係，藉機創造在南亞地區印度能與中共達成勢力平衡的態勢。^⑥

3. 對印度洋控制權的認知

近年來，印度的安全戰略漸次從北方陸地轉向南方印度洋，其著眼在加強對印度洋的控制。歷史上，印度洋一直被英美海權國家視為必須絕對控制的利益。美國國防部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發表的《21世紀美國的戰略》報告稱：能否保衛美國領土的安全，將取決於經濟的繁榮，及能否獲得能源和國際間的重要航運水道的通暢。又說：印度洋是世界戰略資源及國際重要水上通道最密集的区域，美國所需部分石油，西歐所需80%、日本所需幾乎是100%的石油，都須從波斯灣進口。^⑦因此，印度洋尤其是位於北印度洋的波斯灣地區一直是美國全球安全戰略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大國競爭最激烈的地區。印度當然明瞭印度洋對其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印度外長即曾明確表示，「誰控制印度洋，誰就掌握了印度」。^⑧然而，印度若積極扼控印度洋水域上的主導權，勢必會引起美、日等大國的反感，甚至會直接衝擊美國在波斯灣及印度洋地區的利益。反之，印度若不積極爭取在印度洋的權力，則無法與美、「中」、日等大國，在印度洋的經濟與安全議題上平起平坐。近來，印度大量採購海、空軍裝備，都反映出印度想真正掌握印度洋的海上權力。^⑨然印度在印度洋的強勢作為，將會自陷於矛盾之中，畢竟爭奪印度洋的利益勢必會與美國、日本、中共等大國的利益相掛鉤，也會與全球的石油戰略緊密結合，而這些利益又是與印度國家安全及其利益息息相關。

(三) 世界強權國家對印度崛起的觀感

世界各國在一九九〇年中期以後，對印度之所以會重視，有下列幾點理由。首先，印度的經濟已持續若干年保持6%以上的成長幅度，預估未來二十年其經濟成長仍可維持此一數字。其次，各國均承認印度在全球資訊科技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再

註④ Garver,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註⑤ Surjit Mansingh,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sian Survey*, Vol. 34, No. 3 (March, 1994), pp. 285~300.

註⑥ Garver, "The China-India-U.S. Triangle: 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p. 47~48.

註⑦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www.georgewbush.com/Media/PDF/defense.pdf>>.

註⑧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www.indiaelection.com/Media/defense.pdf>>.

註⑨ 宋文木，「印度的大國戰略與南亞地緣政治格局」，*戰略與管理*（北京），2002年第4期，頁86~87。

次印度的國防武力已受世人矚目，尤其是世界強權國家已逐漸接受其為核子俱樂部的成員國。最後，印度不斷的參與國際間的活動，並進一步獲得各國給予的必要支持。基於此，印度自本世紀起即與法國、日本建立起多項合作關係，雙方並舉行高層互訪及進行雙邊會談。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及俄羅斯總普丁也分別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八月及十月分別造訪印度。^⑤在在顯示，印度於本世紀因受綜合國力崛起的影響，其推展大國外交政策，已獲得多數大國的青睞。

肆、印度對外政策的調整

一、結構現實主義觀點的檢視

冷戰期間，印度對周邊安全環境的認知，始終採取一種衝突與對抗的方式，企圖化解安全上的威脅，但效果相當有限。九〇年代末期以降，印度深知若持續運用對抗方式與「中」、巴對峙，印度的國力的發展將會受到限制，其安全也無法獲得保障。因此，印度對外政策作了調整，並朝下列方向發展；一、加強與中共的合作關係以降低印巴之間的衝突。二、強化對外交往策略以抵禦外部的破壞力。三、堅持發展核武能力以保持軍事上的優勢。四、積極推動多邊外交以凸顯大國的實力^⑥等四方面。

一、加強與中共的合作關係以降低印巴之間的衝突

「九一一事件」後，印度藉由與美國及西方國家所建立的「反恐聯盟」，其著力點即是抓住國際間對恐怖主義有共同的「易損性」與「脆弱性」問題，彼此之間較容易建立起安全互賴的關係。另外，印度若與中共始終存在敵對階段，損害程度較大者仍將是印度。因為，「中」印衝突愈深，僅會加速「中」巴之間的合作關係。^⑦此種

註⑤ Christopher A. McNally and Charles E. Morrison, *Asia Pacific Security Outlook 2001* (Tokyo, Japan: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1), pp. 77~80.

註⑥ 馬加力，關注印度一崛起中的大國，頁38~40。

註⑦ 中巴關係的發展緣起於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戰爭。此場戰爭造成中印外交關係的破裂，也使得中巴利益有了匯集之處，雙方利益主要表現於中共與巴基斯坦可共同圍堵印度在南亞地區的發展及其霸權地位。另外，冷戰期間中共與巴基斯坦得以在軍事、政治與外交上快速發展，主因兩國同樣視印度與蘇聯為安全上的威脅。因此，自從七〇年代中期以來，中共對巴基斯坦所提供的協助（包括核武與飛彈技術的輸出），都讓印度深感不安。對巴基斯坦而言，巴國最希望從中巴關係中得到中共在政治問題上對巴國的堅定持，這些政治問題當然包括了對抗印度在南亞地區的霸權、收復具有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省等。在這些方面，中共若願意提供支持，將可大大提升巴國的戰略遠景。然而，中共對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發展，卻能相當的自制，不願對巴基斯坦的任何企圖作出承諾。因為，中共其實已經認知到印度在南亞的霸權地位，並不希望因此而捲入印巴衝突之中。For details, see Mushahid Hussain, "Pakistan-China Defens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1993), pp. 108~111; Swaran Singh, "Sino-South Asian T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4, No. 1 (April 2000), pp. 31~49.

趨勢必然會直接制約印度朝向大國的發展。例如，印度想申請成為聯合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北京就可以拿巴基斯坦當馬前卒來表達反對立場，讓整個討論無疾而終。^⑤因此，儘管印度試圖鞏固與亞洲邊緣重要國家的關係，但絕不可能忽略中共。近年來，印度已意識到中共的影響力，也深知若持續與中共敵對，不僅在南亞國際政治上，無法獲得獨尊的地位，甚至會影響其整個國家的發展。印度已逐漸對中共建立多方面的溝通管道，並儘可能避免與中共發生言辭、政治及軍事的齟齬。^⑥印度更試圖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尤其在可能快速發展的領域，如貿易、科技、商務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⑦二〇〇三年六月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親自訪問中國大陸。訪問期間，瓦杰帕伊首度表明及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藉此希望能與中共加強經貿的往來。^⑧上述作法，都意味著印度欲以振興經濟等務實手段，以因應與中共的良性競爭。

印度對中共外交政策調整的思維不僅擺脫過去冷戰時期「聯盟」、「對抗」的模式，改採合作的方式作為與中共競爭的工具，進而間接地達成降低與巴基斯坦的衝突。華爾志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各國所追求的最高目的為安全，而權力的獲取僅為一種手段，因此國家往往會與實力較強的一方合作以求自保。^⑨比較冷戰前後印度的外交決策模式，不難發現冷戰期間印度是以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努力追求權力的擴展，並採對抗方式與中共及巴基斯坦較勁，以期達成國家的安全，此種模式即是古典現實主義所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權力的追求才能保障國家的安全。^⑩冷戰結束，蘇聯此一強大靠山已不復存在，國際體系因中共勢力的崛起，使得亞洲地區國際權力的結構產生了變化，印度外交態度不得不對中共軟化。此一政策與態度的轉變，可以用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加以解釋。華爾志認為體系結構是一套無形的、潛在的限制條件，且可以限制構成員的行為和互動。系統結構對構成員所造成的影響則來自兩方面：一是系統構成員的社會化；其次則是構成員的相互競爭。^⑪

印度外交決策的改變，可視之為體系構成員社會化的過程。此種社會化過程經常出現在國際體系之中，例如體系中甲影響乙，乙又因為受到甲的影響而發生變化，結果又影響到甲。這種情形正如組織理論家傅雷特（Mary Parker Follet）所說「甲的行為變成刺激它行為的原動力。」^⑫事實上，印度與中共均為亞洲國際體系中的兩個主

註⑤ 龐美瑞編，*中共在亞洲崛起之安全意涵*，頁 279。

註⑥ Sujit Dutta, "Sino-India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2, No. 12 (March 1999), pp. 1821~34.

註⑦ 「印度首度承認西藏為大陸領土」，*中國時報*，民國 92 年 6 月 24 日，版 A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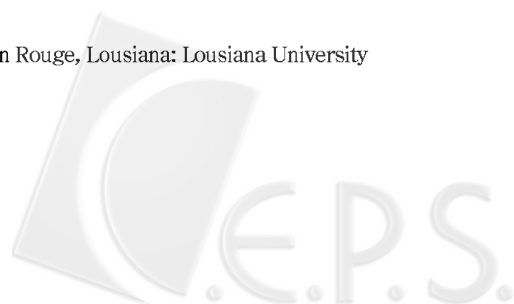
註⑧ 「印度總理訪問大陸，十年首見」，*聯合報*，民國 92 年 6 月 23 日，版 A13。

註⑨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6.

註⑩ Kenneth Thompson,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Baton Rouge, Louisiana: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529~531.

註⑪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5~76.

註⑫ *Ibid.*, p. 74.



要成員國，某一方的行為都會造成另一方學習，此種學習的過程（社會化）都會改變彼此的行為，此乃體系發生影響力的另一種方式。印度採取與中共的合作方式以達成競爭的目的，也是受制於體系的結構所促成的。在與中共競爭上藉由經濟、科技、教育、商務等方面的合作，以化解彼此間的仇恨，增強互信合作機制，使「中」印之間的未來發展能朝向制度化的方向發展。簡言之，體系結構對印度外交決策的改變，實受之於體系中社會化及競爭兩者所帶來的影響，而印度即是在此種體系結構下，調整外交政策以因應外在的新環境。

二、強化交往策略以抵禦外部的破壞力量

冷戰期間，印度的政治立場是傾向於蘇聯，因而印美雙方雖保有正常的外交關係，但限於國際體系結構的限制，使得印美之間的關係並不親密。冷戰結束以後，南亞地區以蘇印為一方、美巴或「中」巴為另一方的對抗結構已不存在，且俄羅斯也無法像前蘇聯一樣提供印度有效的資助，使得印度有機會向外拓展合作的空間。值此期間，印美關係的發展才在印度對外政策調整的推波助瀾下，順利展開。

印美關係獲得改善的主要原因，肇始於柯林頓時期美國的南亞政策。二〇〇〇年三月柯林頓甚至出訪印度，更為印美兩國在反恐議題開創了有利因素。^⑥然一九九八年印度的核子試爆，因嚴重危及到美國在全球的利益，美國則對印度施行了經濟制裁，印美關係的惡化程度陷於谷底。「九一一事件」之後，新德里政府願意支持美國反恐立場，主要是希望藉助美國的反恐立場，一舉抑制巴基斯對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支持。^⑦反之，美國也意識到印度經濟的崛起，不僅成為南亞地區的大國，也是美國在波斯灣、東南亞兩個軍事部署重心之間的最大軍事強國，戰略意義日益重要，此乃美國願意與印度進行安全合作的主要原因。^⑧反恐戰爭期間，印度的各部門領導人均普遍認為印美兩國發展全面的關係，將有利於印度的經貿發展，更對印度國家安全利益具有深遠意義。由此可證，在印度的安全認知中，其對外政策實已將美國視為最重要的部分。

除此之外，印度也意識到若欲鞏固在南亞國家間的霸權，則須發展與南亞周邊國家的合作關係。從印度的地緣位置分析，西邊的波斯灣國家仍將是印度主要的能源供應國，對刺激印度經濟成長具有關鍵性的地位。東方的東協國家已成為印度商品的主要市場、資金和中程技術的來源，以及新的兵家必爭之地。而在北邊則須與中共及俄羅斯保持良好關係，其中俄羅斯仍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應國。所以，當前印度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再像冷戰時期一樣，對其周邊國家漠不關心。反之，印度若欲在南亞地區實現各項直接或間接的戰略目標，都須與各大國維持外交上的往來，才能防止單一外來勢力（巴基斯坦或中共）對印度國家利益的傷害。

註⑥ Garver, "The China-India-U.S. Triangle: 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 37.

註⑦ Dennis Kux, "India's Fine Bal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3 (2003), pp. 93~94.

註⑧ 張力，「印美『安全關係』的形成及其發展走向」，*南亞季刊*，2002年第4期，頁29。



印度與周邊大國不斷強化外交關係，是否出之於對「安全」的敏感度過高，才必須強化大國的友好關係，進而建立安全性的「互賴關係」。華爾志對體系中的互賴關係，應取決於議題的種類。通常在經濟問題方面，他不認為在權力不對等的國家間存有經濟互賴的現象。體系中構成員國實力的差別，對敏感的程度也會有所差異。互賴程度高的國家之間也可能受到傷害的程度也隨之提高，互賴往往是發生在地位平等成員之間的關係。所以，用敏感度來解釋國與國之間經濟的互賴，會犯兩項錯誤。第一、此種說法是將世界看成一個整體，忽略了國家間國力的等級差異。第二、這種說法將國家間所有的互動關係視為互賴的表現，疏忽了國家對互賴敏感高低的程度。^⑨至於在安全（軍事）「互賴」方面，應由體系中「極」數的多寡來決定。華氏認為在兩極系統中，軍事互賴程度相當低，多極系統的軍事互賴程度則相當高。因為在多極系統中，一旦碰到危機或戰爭，主要國家必須要能取得盟邦的支持。而在兩極系統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因為任何一方有國家變節都不致影響兩大超強的對峙局面。^⑩

從結構現實主義觀點看印度強化對外關係的着眼，不難察覺印度是想要造成體系成員國之間權力分配的變化，藉以使南亞國際政治結構發生變化，而結構發生變化也會使互賴的內涵隨之改變。印度強化與美、日、俄的關係，進而想在安全層面上與上述國家達成互賴關係，因為在安全議題上，南亞畢竟屬於一個多極的國際體系，對安全的依存度相當高。而強化與東協國家及日本的經濟關係，則因彼此之間實力相當，對於易損程度的敏感性較為低。是故，印度藉由交往與這些國家較易達成「安全」與「經濟」兩方面的互賴關係，其最終目的即是要降低外部力量對印度造成的破壞率。

三、堅持發展核武能力以保持軍事上的優勢

印度早在獨立建國之前即提出發展自己的核武研究，此一構想是爲了防範印度遭受外來威脅時，可以用來保衛自己，其最初對象是在防範巴基斯坦（一九六二年「中」印武衝突爆發後，對象則增加了中共）對其安全上的威脅。所以，從一九七四年印度試爆第一枚核彈到一九九八年進行大規模的核子試爆爲止，印度已實際擁有 20~60 枚的核彈。依據英國「詹氏情報評論」報告，印度目前的核武數量，其實與英、法、中共等大國的核武數量相去不遠。^⑪

雖然，美國對印度在一九九八年核子試爆表示不滿，更不惜在當年對印度實施禁運措施。但從印度對核子戰略的運用得知，印度的著眼主要抗議美、中間關係過於親密（一九九七年美國與中共締結「中美戰略合夥關係」），其次是對中共從一九九四年起幫助巴基斯坦建立核武的計畫表達不滿，兩項原因更可能對印度的安全造成威脅。^⑫最後則可以藉由核試爆後的印美對話，進而表達印度的立場，爭取美國的支持，

註⑨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43~145.

註⑩ *Ibid.*, p. 169.

註⑪ 馬加力，關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國，頁 61。

註⑫ Garver, "The China-India-U.S. Triangle: 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 43.

進而確保印度成爲核子俱樂部的成員國。事實上，從小布希入主白宮起，「禁止核武擴散條約」一直是印美安全關係中的棘手問題。在印度看來，通過核試後的印美多輪對話，美國的原有強硬立場將有所軟化，特別是小布希政府的戰略思維已超越過去的條約框架，該框架以前一直是美國禁止核武擴散與軍備控制政策的基礎。過去美國不能和印度達成任何的核子禁擴協議。但現今印度希離能與美國有選擇地就「禁止核武擴散條約」和「全面禁止核試爆條約」達成事實上的協議。美國由於顧及美國在「禁止核武擴散」機制中的權威，一直未公開承認印度的核國家地位，但卻已接受了印度發展核軍備的現實。^③儘管目前美國會繼續強調並將印度列入防範全球核擴散和爆發核危機的主要國家，卻也不排除另一可能：即是支持印度，並重組核不擴散機制，幫助印度參與該機制的運作，使印度成爲真正核子俱樂部的會員國。

另外，從印度的軍事與核子能力來看，印度對巴基斯坦的軍力優勢已益形鞏固。而與中共的軍力相比，印度仍略遜於中共。設若，未來南亞發生衝突時，「中」巴採取了軍事聯盟，則印度可能受到的威脅將遠大於單獨來自於中共的軍事威脅。所以，未來祇要「中」印之間仍存在矛盾關係、印巴衝突未能獲得解決，印度勢必持續擴張軍備，其中核武力量的擴建仍將是印度軍事發展的核心。

華爾志對國際體系的界定爲「構成員的地位分配」，他同時認爲構成員之間權力分配狀況的改變，會造成系統結構的變化。而結構的變化更會導致構成員國行爲和結果的改變。^④從印度發展核武的歷史來分析，印度不懼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壓力堅持發展核武，其目的即是要成爲全球核子俱樂部的成員國，讓全球等具有核子武器的大國承認印度核武的「合法地位」。因爲在國際體系中被承認可以擁有核子的國家，往往是被認定爲體系結構中的「大國」，尤其在軍事能力的鑑定標定上，更將核武能力視爲一項重要指標。因此，一旦美國及西方國家對印度研發及製造核子武器，視之爲一種「軍備競賽」，願意與印度進行協商與妥協時，印度的「大國」地位將得以確保，其結果即會如華爾志所說的，構成員之間權力分配狀況改變，會造成系統結構的變化。

四、積極推動多邊外交以凸顯大國實力

長期以來，印度國家戰略的重要目標—使印度成爲世界級的大國。印度認爲，從其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等方面論之，印度是足以成爲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然而，受制於國際現實種種因素的制約，此一願望始終無法實現。

印度爲了一圓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夢想，從一九九〇年代起即不斷加強與亞洲地區各大國的外交關係，其中與俄羅斯及日本建立的合作關係，都可看出印度的強烈企圖。

註③ 張力，「印美『安全關係』的形成及其發展走向」，頁31。

註④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7.



印度之所以願意與俄羅斯維持昔日冷戰時期的外交關係，主因俄羅斯可以幫助印度成爲世界大國。不可否認的，任何戰略的選擇其背後都有著巨大的戰略利益。從二〇〇〇年九月印俄簽署的《印俄戰略夥伴關係宣言》來看，印俄雙方存在的共同利益是造成彼此合作的主要原因。在政治上，俄國可以幫助印度成爲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並推進印度以大國姿態走進國際舞台。在軍事上，俄國仍將是印度最大的軍火提供者，印俄的軍事合作亦可制約中共軍事的發展。在科技和經貿上，雙方都存在互利合作的議題，例如，兩國政府都願意共同在海洋資源研究、農業科技、醫學、生物科技、環保等領域加強合作關係。印俄兩國更同意在投資環境與消除關稅方面加強合作，以促進雙邊貿易的增長。^⑤顯而易見，印俄關係的強化，對於印度在南亞甚至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地位有明顯加分效應，更可擴大印度與其他大國交往的籌碼，進而擴張印度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爲印度走向國際舞台的核心，創造一個有利的戰略環境。相對的對俄羅斯而言，印俄戰略夥伴關係也強化了其大國地位、擴大了戰略活動空間、贏得了與有關國家交往的資本，並爲其帶來更多的利益。因此，印俄關係的發展是在一種「互利」、「互助」的基礎上，創建出的合作關係。

至於與日本的合作關係上，印日雙方存在共同的利基點，即是彼此都希望成爲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在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持下，不斷加深日本在聯合國的影響力，同時日本也在負擔了聯合國資金的 12.45%，比英、法、中共的總和還要多。^⑥所以，日本有極強烈的意圖，想成爲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印度與日本一樣存有相同的企圖，所以雙方如何處理這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是日印雙方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沒有兩國的彼此合作，想達成雙贏局面相當困難。另外，從經濟與石油安全的角度看印日之間的發展，日本深切明瞭印度所處的地理位置，實居於日本海上石油生命線的要衝位置，對日本的經濟發展極爲重要。再者，日本也相當看重印度新興市場的龐大潛力，此一市場對日本的商業可說是一個大好商機。相對的，印度看重日本的是來自於日本爲經濟大國，每年日本在海外的投資都爲當地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所以，印日兩國得以在多方面達成共識，進一步加強彼此的合作與交流。

從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探討印度的多邊外交政策，可看出印度運用與大國建立的合作關係，目的在爭取作爲區域大國的地位，以獲取更大的安全利益。印度決策者也愈來愈相信，隨著印度經濟實力不斷的茁壯，印度更須要與全球各大國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而藉著彼此的交流與互動，可以在全球事務中扮演積極與負責的角色，如此不僅能確保國家安全，更可提升印度的地位和自主性。

註⑤ 馬加力，前揭書，頁 148~150。

註⑥ 尹錫南，「試論印度與美國日本的外交戰略互動」，南亞季刊，2002 年第 4 期，頁 42。

伍、印度對外政策中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若干問題

一、「安全」與「權力」的界定及操作困難度高

結構現實主義者認為安全是國際社會成員所共同追求的目的，而權力的獲得則是達成安全的一種手段，國家的最終目的則是藉權力以達成安全目的。從此一觀點分析全球國際體系得知，美國在南亞的國際政治結構中，是將權力的獲得與運用視為一種操作性的工具。因此，美國對於印巴之間的態度與轉變，無非僅是視客觀環境的變化，而採取的一種謀略性的操作方式。「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及美國後續反恐戰爭的遂行，對南亞地區的安全與政治的結構確實產生了重大影響。印巴之間的衝突已成爲美國在中亞地區實行「反恐怖行動」首先必須考慮的重點，而美國出於反恐戰略的實際需要，必須將巴基斯坦視為反恐行動的主要盟友。印度則遭受巴基斯坦所支持的喀什米爾省的伊斯蘭恐怖組織襲擊，印巴問題隨即與美國的反恐戰爭掛鉤，成爲一個錯綜複雜的難題。本質上，安全問題已成爲印美兩國在南亞地區合作的共同利基，但此種利基卻是建立在一種複雜與矛盾的基礎上。在南亞地區安全的問題上，儘管美國在阿富汗反恐作戰行動中，調整對巴基斯坦的友好政策。而在戰爭結束後，美國又逐漸調整政策且傾向於印度。美國出於防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需要，不可能完全放棄傳統盟友巴基斯坦，以免引起印巴衝突失控，導致不可收拾的後果，反而會傷及到美國在南亞地區的利益。

換言之，美國的南亞安全戰略是有次序性與時間性的分配。在次序性的權力運用上，當反恐行動須要巴基斯坦的協助時，美國會將權力的分配與外交的重點置於與巴基斯坦的合作關係（重巴輕印），一旦反恐戰爭結束，美國又會將外交的重點回復到與印度建立大國層級的外交關係上（重印輕巴）。在時間的安排上，美國更會將反恐戰爭與印巴衝突的急迫性，加以區隔。畢竟，美國是將南亞地區視爲全球一個區域，南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僅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亦可稱之爲美國的全球戰略）的一部分。反之，美國的反恐戰爭則爲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軸（爲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在此立基點上與其他國家所建立合作關係，都可視之爲美國權力操作的手段而已。美國真正的意圖：與印度建立夥伴關係有利於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國家利益，進而以此「夥伴關係」制約中共勢力的崛起。美國發展與印度及中共的雙邊關係，不但是要在亞洲達到權力平衡的目的，是要在不同的領域中，與這兩個大國保持各自的合作關係，以防止中印兩國共同合作對抗美國。^⑦相較於印度，印度的安全戰略則與印巴之間的衝突密不可分，印度對付巴基斯坦可視爲印度國家戰略的主要目的，^⑧爲達成此一目的，

註⑦ Garver, "The China-India-U.S. Triangle: 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p. 1~2.

註⑧ 張力，「『九一一』事件後的印巴關係與南亞地區安全」，頁44。

手段上則藉由改善與美國、中共、俄羅斯等大國的關係，以降低印巴衝突的可能性。因此，要瞭解印、美兩國對「安全」的認知，須從美、印兩國如何操縱國家戰略的手段來看，才可完理解「反恐戰爭」的真正意涵。

結構現實主義視國際的結構為「構成員的地位分配」。⁷⁹易言之，也就是一種「大國之間權力分配」的問題。印度在南亞堪稱為大國，但其影響力僅止於南亞鄰近區域和亞洲的次要議題上。而國際層次的重大議題的決定，印度仍須視美國的立場而調整，畢竟在美國的觀點中，印度僅能視之為區域的大國，其實力與美國相比仍有天壤之別。因此，用「權力」與「安全」的角度探討印度的對外政策，必須仔細區分該議題的層級是屬於「國際性」或是「區域性」的，否則將會混淆權力與安全的真正意涵，更會錯置「大國」的真正意義。

二、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的互動關係

結構現實主義假設國際社會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其本質為「自利」與「衝突」。華爾志認為，無政府的國際社會結構主要是藉著體系結構控制著所有行為體，而結構也決定了國家與國際社會的行為。⁸⁰針對此點，新自由主義學者則認為，現實主義者過分誇大無政府狀態的重要性，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甚至指出，無政府狀態雖是國際社會的現象，但世界政治的持續特點，在於允許國家互動的各種模式存在。⁸¹華氏針對上述的評論，認為他的結構現實主義是將「人」與「國家」間的關係聯繫起來。易言之，人創造國家，國家也創造人，國家同時具有人與團體的雙重身份。雖然，國家有時也會像人一樣具有理性與非理性的兩面，維繫國家間的理性須要依靠「利益」作為基石，才能建立合作的共同空間。華爾志並認為祇有在結構中的所有國家處於相對的安全（共同的安全利益）狀態時，國際體系中的穩定局面才有可能形成。所以，權力僅能視之為手段，安全才是維護國家的最高目的。⁸²

實際上，每個行為體在處理國家安全事務時，大多處在安全的困境中，對於任何一項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其背後所承擔的風險都足以立即改變政策的決定。例如，在南亞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印度雖可稱為南亞的一極，但在美國介入地區的反恐戰爭後，整個結構卻變成美國為南亞地區的獨霸，印度卻反而成為區域內次極國家。印度為了國家的安全，以免印巴衝突一再的威脅印度國家的發展，而選擇與美國在「反恐」議題上合作。巴基斯坦為了拉攏美國不惜犧牲昔日的盟友－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與美國共同執行反恐戰爭。由此得知，美國在全球國際體系中，為一超強國家，而在「反恐戰爭」中也成為南亞國際體系中唯一的「單極」，無論在全球與區域之中，結

註⁷⁹ Waltz, 胡祖慶譯, 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 頁 103。

註⁸⁰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0~81, 91~93.

註⁸¹ 王逸舟,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 頁 4。

註⁸²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3~128.



構現實主義都可以解釋美國的行徑，也似乎可以解釋南亞的國際現象。例如，印、巴願意與美國合作，實乃出於某一特定議題（安全），一旦反恐戰爭結束，或是其他與印巴兩國國家利有妨害時，兩國可能會選擇與美國相反的態度，核武試爆問題即為一例。再如，二〇〇〇年十月印俄所建立的「印俄戰略夥伴關係」。雖然兩國在夥伴關係的宣言中，明確表示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並不對其他任何國家或國家組織，也不尋求建立軍事聯盟。但二者均主張國際關係民主化，顯然雙方是針對「霸權主義」而來，此一霸權當然是指美國。再如，印度洋海域的主導權而論，印度希望能對此一區域具有完全的操控權，但美國卻不甘完全受制於印度。但基於尊重區域強國的意志，美國即使是全世界最強大的海權國家，也不得不有所退讓。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認為，印度擁有幫助維護廣闊印度洋及周邊地區安全的能力，而且印度是美國對外政策越來越聚焦的國家，又說，印美在密切關注北京不斷擴大的軍事能力和限制中國的擴張方面享有共同的利益。^③

由以上三例即可得知，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雖是由體系中的大國主導主要的國際事務（權力分配），然大國與次級大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卻非全然由大國主導，而必須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否則大國與次級大國必然會處在衝突與對峙之中。所以體系決定結構的變化，而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對結構會造成影響，僅能視之為一種應然面。實然面則須再細述行為體之間的利益是否存有共同的合作議題，否則無法完全解釋體系與結構之間的變化。換言之，運用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必須注意該理論的適用範圍，它仍有侷限性的因素存在。

三、影響衝突與合作的相關因素

衝突與合作是無政府國際體系中兩大研究區域。通常針對國際間的經濟事務，因存在明顯、真實及可預期的利益，較易達成彼此間的共識、原則、規則和體制，故採取合作的論點較能解釋國與國間的關係。但是安全往往存在兩難的困境之中，要達成合作的共識較為困難。誠如杰維（Robert Jervis）所說，在一定的領域；如核擴散和武器試驗等方面，就存在穩定的規則和原則，但廣泛性的議題則較不容易形成規則與原則，安全制度即會變成非常不真實。^④往往安全困境也非是靜態的，而會夾雜著許多議題在安全的事務中。例如，印度為了防止「中」巴合作所帶來的不安全，他會暫時擱置長久以來與中共的敵對關係，進而加強與中共的經貿合作關係。^⑤同時，為了防止美國在亞洲的獨霸地位，也願意與中共在共同維護開發中國家的正當權益，推進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進程。^⑥然而，印度與中共所建立的互賴與合作關係

註③ 馬加力，「印度加速向世界大國的步伐」，*國家安全通信*（北京），2001年第4期，頁28。

註④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Spring 1992), pp. 362~370.

註⑤ 「溫家寶會瓦杰帕伊『中』印增信釋疑」，*聯合報*，民國92年6月24日，版A13。

註⑥ 同上註。

卻非堅實牢固，反而是建立在一種雙方都認為有利可圖的基礎上。因此，在安全議題上，衝突與合作是兩個相互滲透與相互制約的兩個領域，不容易用原則與規範來律定之。反而必須把規範與實益同時運用在同一種事務之中，且處在對立與矛盾的關係之中。換言之，衝突與合作兩者都是結構現實主義強調的領域，若僅使用單一領域則較難解釋國與國的安全議題。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當兩國存在以下情況，則雙方會存有合作與互賴的情況，反之則存在衝突的因素。

1. 易損程度及敏感度均較低狀況下，雙方合作及互賴情形較易形成。
2. 兩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愈為接近時，互賴與合作的程度會愈為親密。
3. 雙方在某些議題上有「互利」的狀況時，則較容易形成合作與互賴的條件。

陸、結 論

印度國家安全政策隨著冷戰結束及國際格局的改變，作出了大幅度的調整。此舉也在其綜合國力提昇及核子戰略運用的推波助瀾下，印度儼然已成為南亞地區超級大國，印度的國家安全也在上述諸因素的滲透、支持下，使印度的外交政策變得愈來愈靈活。而南亞地緣戰局的格局更因印度取得的優勢地位，使得印度成為繼中共之後另一個亞洲的強權國家。尤有甚者，印度持續發展核武能力，已逐漸取得世界核武大國的認同，使得亞洲地區的大國不得不提高印度的國際地位，印度在南亞地區的國際地位將因此更加鞏固。印度的崛起使印度極欲在亞洲甚至全世界舞台上一展頭角。未來國際的格局中，印度已是一個不能再讓世人疏忽的大國。

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主在論述體系與構成員國之間的互動關係，由於主要構成員國的利益和體系的利益不可分，因此構成員國即使要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他們也樂於付出以維持體系的穩定。冷戰結束後，兩極對抗格局已黯然消失，中共因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進而推展「睦鄰外交」政策，減緩了亞洲社會的緊張氛圍。印度因應體系結構的變化，對外政策放棄了以往「孤立」與「對抗」的外交策略，而以積極的外交手段與世界各大國發展多邊的合作關係。事實上，印度當前對外策略首要目標仍是確保其國家的安全，然不同以往的是，在「一超多極」的國際體系下，印度已將其國家安全問題與國際安全議題結合為一。

印度要走向世界大國之林，必須仔細分辨國家安全與追求大國地位的兩項目標。印度目前顯然已認識到美國是未來印度要邁向世界大國之林的重要外交國，印度甚至瞭解，若無美國默許，甚至主動協助，印度要想成為區域霸權，並快速發展經濟、維持社會穩定的目標將難以達成。^⑥因此，從印度與美國及多數大國家的交往來看，印

註⑥ 理查艾林斯、阿隆佛瑞柏格編，2001-02 戰略亞洲：權力與目的，頁 349。

度的國家安全政策是符合華爾志結構現實主義的主張。然而，安全與權力、競爭與合作、「互賴關係」與「易損程度」之間的關聯性，絕非任何國家可以任意操縱，核心在於該議題為「區域性」或是「國際性」，以及國與國之間的等級是否為同一等級。否則，印度欲推展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與互賴關係，將會呈現不平衡的發展趨勢。

* * *

(收件：92年10月17日，初審畢：93年1月15日，複審畢：93年6月18日，接受：93年9月1日)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ltz's Structural-Realism

Min-yuan Hu

Instructor,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India has continuously upgraded its power as a result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by means of nuclear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 India has made itself a unique powerful nation in South Asia.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adjustment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real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addition to eliminating the threat from Pakistan, India wants to become a strong state in South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If India continues to grow, it might become a hegemon in South Asia.

Keywords: Structural-Realism; India;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Security



參考文獻

- 王良能（2000），《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台北：唐山出版社。
- 王逸舟（2001），《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理查艾林斯（Richard J. Ellings）、阿隆佛瑞柏格（Aaron Friedberg）編，余忠勇、吳福聲、李育慈、黃俊彥譯（2002），《2001-02 戰略亞洲：權力與目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周特新、羅志丹（2001），《亞洲：新世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湖南：人民出版社。
- 周煦（2003），《冷戰後美國的南亞政策》，台北：生智出版社。
- 倪世雄（2001），《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出版社。
- 馬加力（2002），《關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國》，天津：人民出版社。
- 張虎（1996），《剖析中共對外戰爭》，台北：幼獅出版社。
- 孫士海（1997），《印度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趙曉卓（2002），《南亞雄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樓耀亮（2002），《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 龐芙瑞（Carolyn W. Pumphrey）編，郭家琪、余佳琳、林文怡譯（2002），《中共在亞洲崛起之安全意涵》，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文富德（2002），「西方經濟衰退中的印度經濟」，《南亞研究季刊》，2，1-7。
- 伍福佐（2002），「試析布希政府對印巴危機的處理」，《南亞研究季刊》，4，34-39。
- 伍福佐（2002），「試析反恐對印美關係的建構」，《南亞研究季刊》，3，33-38。
- 何道隆、晏世隆（2002），「911 對印度在世界與地區政治格局中地位與作用的影響」，《南亞研究季刊》，4，22-27。
- 吳征宇（2003），「『結構理論』的結構」，《國際政治月刊》，6，24-32。
- 邱坤玄（1999），「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外格局」，《東亞季刊》，1，23-38。
- 伊錫南（2002），「試論印度與美國、日本的外交戰略互動」，《南亞研究季刊》，4，40-47。
- 榮鷹（2002），「印度全方位推展大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3，24-25。
- 馬加力（2001），「印度加速向世界大國的步伐」，《國家安全通信》，4，26-31。
- 張文木（2002），「印度的大國戰略與南亞地緣政治格局」，《國際政治研究》，4，85-90。
- 張力（2002），「印美『安全關係』的形成及其發展走向」，《南亞研究季刊》，4，28-33。
- 張力（2002），「『911』事件後的印巴關係與南亞地區安全」，《南亞季刊》，1，44。

- 書宗友 (2003), 「制衡、追隨與冷戰後國際政治」, 《國際政治月刊》, 6, 16-23。
- 楊平學 (2002), 「淺析制約中印關係的幾個主要因素」, 《南亞研究季刊》, 1, 38-41。
- 戴曉東 (2003), 「單極世界的變數」, 《國際政治月刊》, 6, 33-38。
- 「印度總理訪大陸十年首見」, 《聯合報》, 民國 92 年 6 月 23 日, 版 A13。
- 「印度總理訪北京搭互信橋樑」, 《聯合報》, 民國 92 年 6 月 23 日, 版 A13。
- 「溫家寶會瓦杰帕伊『中』印增信釋疑」, 《聯合報》, 民國 92 年 6 月 24 日, 版 A13。
- 「印度首度承認西藏為大陸領土」, 《中國時報》, 民國 92 年 6 月 24 日, 版 A13
- Bajpai K. Sbankar (2003), "Untangling India and Pakistan," *Foreign Affairs*, 81, 112-126.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Charles Little (1993), *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arver, John W. (2001),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Hewitt V. M. (1992),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outh Asia*, Manchester, U. 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n, Stanley (1980), *Primacy or World Ord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New York: McGraw-Hall Book Company.
- Hussain, Mushahid (2000), "Pakistan-China Defens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24, 31-49.
- Jervis, Robert (1992),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342-370.
- Jim, George (198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Thinking Space: 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 259-75.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Keohane, Robert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issinger, Henry A. (1994), *Diplomacy*, New York: Schuster Press.
- Krasner, Stephen (1985), *Structural Conflict*, Berk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ux, Dennis (2003), "India's Fine Balance," *Foreign Affairs*, 81, 93-106.
- Little, Richard (198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
- Mansingh, Surjit (1994),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sian Survey*, 34: 3, 285-300.
- Morgenthau, H. J. (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jolander, Claire Turenne and Cox Wayne S. (eds.) (1994),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 Tellis, J. Ashley (1986), "The Air Balance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rends, Constants and Contexts," *Defense Analysis*, 4, 254-278.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 N. (1985),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Waltz, Kenneth (1990),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24-56.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1, 5-41.
- Wayne, S. Cox and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1994),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 Zalmay, Khalilzad, D. Orletsky, Jonathan D. Pollack, Kevin Pollteter, Angel Fabasa, David A. Shlapak, Abram N. Shulsky and Ashley J. Tellis (2001),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